

20世纪30年代
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

陈宇/编著

谁最早口述

长征

CHANGZHENG

解放军出版社



谁最早口述长征

——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

陈宇 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
陈宇编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ISBN 7-5065-5083-0

I. 谁... II. 陈...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
—史料—研究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1967号

书 名: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

作 者:陈 宇

责任编辑:李建力

装帧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周玮·焦金仓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499千字

印 张:32.625

印 数:1~6000册

版 次: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65-5083-0/I·829

定 价:3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长征，一个讲述不完的故事（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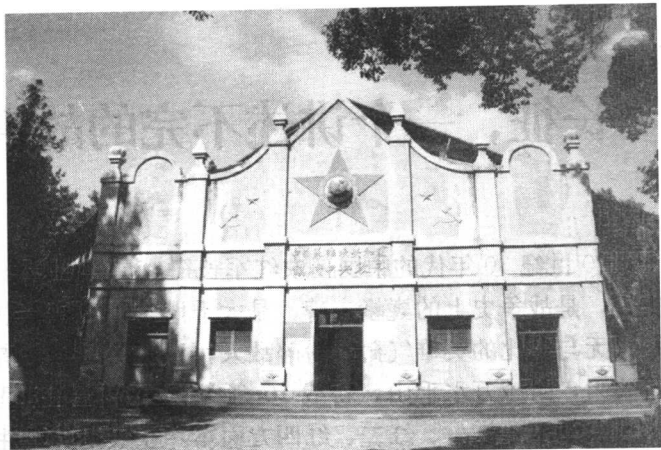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战争史上的巍峨丰碑，是大千世界万千故事中的惊险传奇。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粉碎敌人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转战10余省，行程二万余里，历时两年，三大主力红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实现胜利大会师，完成了绝处逢生的战略大转移。一部长征史，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又特殊，留下的文献档案极少。作为长征主体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征途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因此，关于红军长征史，今天人们所了解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红军将士的回顾和记述。

自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征途到达陕北之后，有关记述长征的文章即很快面世，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从长征口述史的概貌看，可主要划分为3大块：

（一）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口述长征，翻开长征口述史的第一页。（1）陈云是第一位向世界口述红军长征的人。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也是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口述历史。陈云1935年8月在上海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开始连载于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2）1936年6月，毛泽东等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讲述长征。这年底和1937年初，斯诺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连载发表了30余篇访问陕北的一组报道；1937年3月在北平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中译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发行。这期间，一些中国记者也来到陕北苏区，采访红军将士，搜集长征资料，撰写了一批文章，如范长江的《塞上行·陕北之行》、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等。

（二）长征将士群体口述长征史。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1936年8

月5日，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编辑出版“长征亲历记”征稿。编者从征集到的200多篇文稿中精选出100篇进行反复修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2002年11月陈宇摄)

改，这本汇辑后定稿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红军中高级将领。《二万五千里》在1942年正式出版，书名为《红军长征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这本书成为专题记载红军长征史实的最早文献，是群体口述长征史。此后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等有关长征的专题书籍，篇目多源于此书。

(三) 新中国成立后撰写发表的回忆文章和传统教育材料、报告。主要有周年纪念回忆文章，将帅回忆录，地方史采访记录，等等。几十年中，形成了3个较典型的阶段性成果：一是解放军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有关红军长征的专辑；二是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顾长征》；三是1990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这3套书比较系统地汇集了红军将士回顾长征的文章。此外，还有全国各省区中共党史征集办公室、史志等部门采访和搜集整理的大量口述长征文档。

统览长征将士口述长征的概况，在形式上大体可分为3类：(1) 撰写专题文章、纪念文章和回忆录。作者是长征史的叙述者，也是记录者；(2) 讲故事，作报告。多是老红军在部队、学校进行传统教育时的讲稿或记录稿、录音整理稿，也有领导人在一些会议上关于长征的讲话；(3) 采访记录。由长征亲历者口述，别人代笔整理。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长征口述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直接凝固为长征史，链接了已知史实之间的空段，拾遗补缺，极大地弥补了原有



史料的不足，丰富了长征史料的维度；二是佐证长征史，互相印证，校正偏差，纠正了一些原几乎成为定论的谬误；三是使长征史更加形象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立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丰富多彩的长征史，其详细情节大多数来自于口述，因此更加增加了其传承的群众性和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

目前，当年亲历红军长征的在世老人都已是垂暮之年，有关长征的口述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到了最后“封顶”阶段。据笔者多年来所掌握的红军将士回忆文章，总量约在 1500 余篇（不含内容重复的篇目），这



延安宝塔山

(2001年9月陈宇摄)

是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史的讲述和研究，经历了从重点叙述将帅的长征，走向叙述普通战士的长征，再到经久不衰的重走长征路的热潮。在当代，人们闲暇时津津乐道长征路，在红色旅游中别样体验雪山草地的风情。可以展望，在纪念长征胜利 70 周年活动之后，人们从以往较多地关注长征事件本身，将逐步进展到关注长征精神，会更多地从人文、人性的角度讲述长征，重新认识长征。

长征，是精神力量之宝藏，有着讲述不完的故事。

以上论点，是笔者在 2004 年 12 月于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上的一个发言提要。

长征史研究，是笔者从事军事历史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一个专题，并且情有独钟。30 年前参军入伍就在川西，后为研究和写作又曾八访长

征路，对那片热土、那道红线有着别样的感情。20年前大学学史，专业即是中国现代史，所写论文多数与红军长征有关，这些文章后构成了出版长征专著的基础。10年前的纪念活动时，出版了《长征精神万岁》、《草地龙虎》、《血火煮江山》、《蒋介石败战长征路》等专著，并负责全军此项活动的论文征集和编纂《英雄史诗，丰碑永存》工作，为中央电视台“长征剧组”撰写稿本等。为此，多年来也结识了许多老红军，并在部队、学校、企业讲课，专题讲述的多是红军长征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积淀，搜集到了一些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在又逢纪念长征之年，几家出版社邀请再作“长征”，思虑再三，以为还是将此“口述长征”资料先整理出为好，以供研究和爱好这段历史的朋友们作为参考。

本书所录“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目”，是笔者积20余年研究长征资料的一个汇总。这些篇目基本囊括了70年来“长征口述文档”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口述长征史的基本脉络。笔者以为，“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不掌握这些资料，就无法全面理解长征，更谈不上深入研究长征。从这些原始文档中，细心之人会发现，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有些几乎成为定论的“史实”，显然在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说不清楚的，但是毕竟苍天有眼，一些关键性的文档已经留了下来，留待后人研究。

本书的出版，希冀对更深入地研究长征提供一点资料和线索。在此特向为本书撰写提供帮助的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以及本书所引用和借鉴学术成果的诸位学长及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历史文献资料的汇集、注释和解读，是一件很“熬人”费时的事，其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竭诚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充实。

作者

2005年秋于北京三座门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长征，一个讲述不完的故事（代序） / 1

1 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 / 1

——解读陈云《报告》和施平《英勇的西征》

附注：陈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施平《英勇的西征》（一九三六年春）

2 陈云假托军医之口说长征 / 63

——解读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

附注：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九三五年秋）

3 中国记者报道红军长征 / 113

——解读范长江《成兰纪行》和《陕北之行》

附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塞上行·陕北之行》（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4 系统介绍长征的经典连载报道 / 163

——解读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

附注：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由甘肃到山西
——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后一阶段》（一九三七年七月）

CONTENTS

目录

5 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记述长征 / 283

——解读勃沙特《神灵之手》

附注：R·A·勃沙特《神灵之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6 国内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程的文章 / 360

——解读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附注：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九三七年五月）

7 外国记者最早采访长征将士的口述史诗 / 382

——解读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长征》

附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一九三七年十月）

8 红军将士群体撰文回顾长征 / 439

——解读红一方面军编《二万五千里》

附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

9 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目 / 466

（一）红军将士回顾长征

（二）国民党军将领讲述围追堵截红军长征

（三）部分内部资料未刊稿



1

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

——解读陈云《报告》和施平《英勇的西征》

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陈云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月后，有人将其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第三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第2期合刊上。目前，史学界对这篇文字整理者的情况还未探明。一般认为，《英勇的西征》的作者署名“施平”，可能是根据陈云当时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谐音的缘故。1996年，中央档案馆和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第5期根据中央档案馆藏件，曾全文重新发表《英勇的西征》。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又发表了新近发现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陈云所作《报告》、施平撰写的《英勇的西征》与陈云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同为最早宣传、介绍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长征的文献。本书所附《报告》和《英勇的西征》原文，仅对个别文字、标点，作了校正，保持了文献原貌。

陈云与长征

陈云，1905年生于江苏青浦县，15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只有高小文化，但在5年的学徒生涯中，几乎读遍了书店里的书。学徒期满，他转至虹口书店做店员。不久，五卅运动发生，上海迎来了罢工运动最汹涌澎湃的岁月，陈云的思想在罢工风潮中产生飞跃，于



陈云

1925年8、9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务工作。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在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云是政治局六成员之一。1933年1月下旬，陈云随博古到了瑞金。博古到达后即着手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央局，陈云为中央局成员、常委。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10月20日，陈云与陈伯钧领导的红五军团第13师渡过于都河西进，随红五军团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当时红五军团是后卫部队，军团长是董振堂。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部队在这里作短期休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陈云此时先后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

这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上海中央局及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幸而有红二、红六军团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方使上海局所派交通员于1935年3月找到那里。任弼时在考察并肯定了来人后，将上海中央局被破坏的情况致电中央，中央即决定派潘汉年速去上海，然后与陈云长期潜伏上海，恢复中共地下党工作并寻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先期从遵义取道贵阳、香港，后到上海。

在中央红军攻占泸定桥后，6月上旬，陈云受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领导恢复和开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陈云于6月中旬通过各种关系辗转经过成都、重庆，只身乘船于7月到达上海。

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连续4次遭受严重破坏，经潘汉年



联络，陈云终于与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取得了联系。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陈云很难在上海立足，指示他和潘汉年都去苏联。潘先行一步，陈云则在赴苏前的日子里，写下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地记叙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川康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经历，以旁观者的身份，盛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

9月上旬，陈云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陈云同陈潭秋、曾山等人一起，秘密登上一艘苏联货轮抵达海参崴，又从海参崴换乘火车赴莫斯科。10月，他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

史学界以往对陈云在1935年6月从长征途中的大渡河畔抽身离开红军队伍赴莫斯科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对陈云是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和红军情况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多年来却一直没有找到文献记载。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终于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



遵义会议会场

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这就是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

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

世纪之交新发现的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弄清了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报告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前期情况，也就是在自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情况。

《报告》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前期的主要情况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的《报告》，现经整理，共有18890余字。主要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前期的经过、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并分析了红军长征前夕所犯的错误。

1.《报告》指出，红军在长征前夕所犯的“纯军事性质的错误”主要有：（一）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完全可以诱敌深入于苏区，围而歼之。（二）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领导人却分散了兵力，使红军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丧失了机动能力。

2.《报告》认为，中央“左”倾领导人对待“福建事变”中第十九路军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深刻检讨了在“统一战线”上所出的问题，这也是红军被迫举行长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由于我们对十九路军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首先犯了军事错误。”当蒋介石进攻第十九路军时，红军本应当派部队援助，但是却没有这样做。相反，红军的主力部队开向了背道而驰的方向。如果红军不犯这个错误，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陈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也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惟一正确的方针。”

3.《报告》总结了长征的准备主要有3项：一是当主要部队还没有从中央苏区向西开拔以前，中央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苏区境外，深入敌人的后方。二是对红军基本干部加速实行了训练。三是在战略大转移前夕，采买了60万石粮食。



4. 《报告》难得可贵地指出了红军在长征初期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 5000 人。”由于辎重太多，红军没能及时攻下全州，而结果是被敌人抢先占领。如果不是带的辎重太多，红军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黔边界地区，红军为战胜敌人的阻击，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红军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 100 公里到 150 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发起攻击。红军“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

“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报告》还真知灼见地指出：“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这就是遵义会议所作出的撤换错误领导人，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

5. 《报告》比较详尽地叙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役、战斗，如突破 4 道封锁线、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并叙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作战经过，仅如红军在翻越夹金山前从泸定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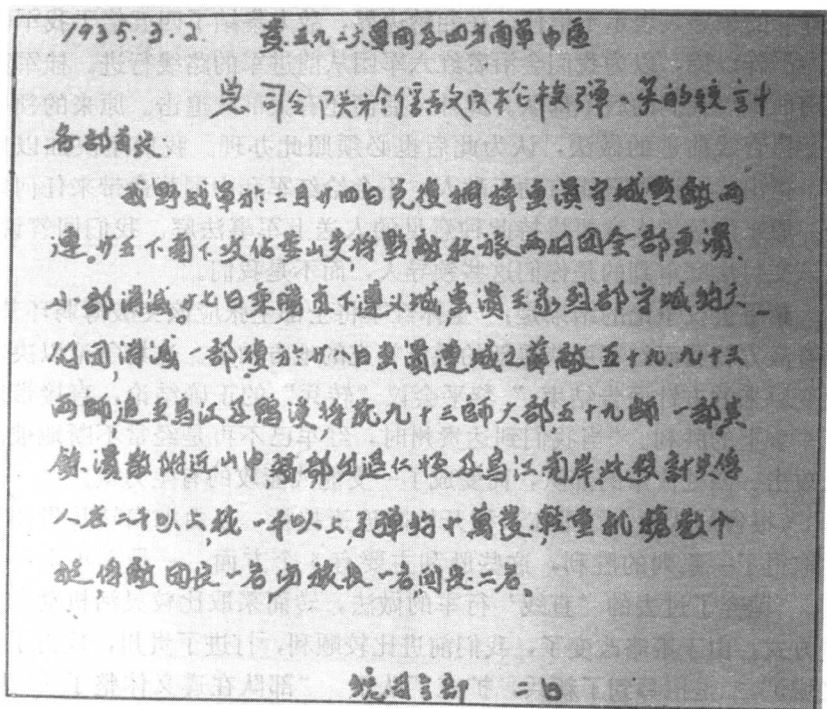
天全县城的战斗经历：“从渡口到雅州，都是平坦大道。敌人沿路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于我们不利。我们决定避开大道走小路，但要翻过一个山口。当我们翻过山口进到村落时，村民们简直惊呆了。他们想象不出我们是怎样到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先辈传说有山路可通，但是几百年来从没听说有人翻过这么高的山。我们仿佛从天而降。这座高山，我们是爬着过来的。有些地方，泥深过膝，我们从中穿行。下山后，我们却又碰上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整整攻了一天，仍未能将敌人赶走。于是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轻装前进。待他们占领了一座高达 16000 英尺的山峰时，我们才攻克了天全县城。”关于这段战斗过程，至今还没见有更为详尽的资料记载或口述史料。

6. 《报告》精辟地总结了红军取得胜利的原因。认为，首先是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其次是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他们在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三是红军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因此说，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党的正确领导、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这 3 个基本特点，是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报告》特别讴歌了红军将士英勇无畏、越战越强的精神风貌，并指出，在共产国际七大展览会上，有一幅宣传画，把中国工农红军画成了穿着破衣褴衫的队伍，这是不真实的。

《报告》中的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长期以来对这次会议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个世纪，党史界对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笔者在大学中学习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犹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课堂中听中共党史专家的讲课内容，热点之一就是讲遵义会议召开时间及内容等争论问题。其实，遵义会议至今仍充满着不少未解之谜。

当代人对遵义会议的了解，最初多是来源于个人口述回忆资料，诸如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但是，却鲜见有文献资料。从文献方面真正了解遵义会议，是 1984 年公开发表的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96 年公开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中也提到了这次重要会议，接着就是 2001 年《党的文献》杂志第 4 期刊发的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的译文。这是继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发表之后，又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史料价值重大。



红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的战况统计

关于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陈云的《报告》虽然没有展开说，但把会议决定的最主要的内容作了介绍，这就是，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他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西征”第一阶段作战中受到很大的损失。

陈云在《报告》中指出，“西征”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4道封锁线，但是在军事指挥上、组织上存在着错误：部队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给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红军在开始时的行军路线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人，红军成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对象。

《报告》叙述了遵义会议的前奏“黎平会议”。“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

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黎平会议争论的结果是：“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黎平会议“转兵”的正确结论，直接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报告》认为，红军在长征开始时连遭挫折，在由湖南转兵贵州后才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军事上的胜利。“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招募到了新兵，扩充了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12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3000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三是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特别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陈云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报告》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成熟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这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以上可看出，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其目的主要在于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